

《中西法律传统》

Legal Traditions of the West and China

2023 年第 2 期 (总第 25 期)

造作有式：法学视角下《营造法式》的属性、地位与功能^{*}

喻 平

摘 要 | 北宋时期的《营造法式》，不仅是官订的建筑技术专书，也具工程建筑法典性质。“法式”自古有规章之意，《营造法式》具有法典式的编纂颁行程序、体例结构与规范属性。《营造法式》与相关律、令共同规范营造活动，在宋代工程建筑法律体系中地位独特。《营造法式》在预算、施工等工程建筑管理中具有多重规范功能。从法学角度，《营造法式》可推动新文科背景下法学、建筑学交融发展，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，可为当下工程建筑管理法治化提供借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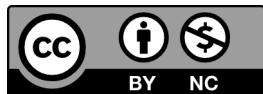
关键词 | 营造法式；法律属性；法律地位；法律功能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

作者简介 | 喻平，法学博士，湖南理工学院法学院副教授，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。

Copyright © 2023 by author (s)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

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[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NonCommercial 4.0 International License](https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nc/4.0/).

<https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nc/4.0/>



作为建筑设计与施工专书的《营造法式》深受学界重视，研究成果颇丰。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，围绕《营造法式》的研究从营造学社开始，成为几代建筑史人毕生事业，代表成果有梁思成的《〈营造法式〉注释》^[1]和陈明达的《〈营造法式〉大木作制度研究》^[2]。近年来，《营造法式》研究

走向多元，学者从版本、建筑、装饰艺术、遗产保护、文化比较研究等领域对《营造法式》开展探讨，充分展现了《营造法式》的学术价值。但是，从法学视角研究《营造法式》的成果并不多见。刘思捷从传统礼法制度出发解读《营造法式》，指出其本质是传统建筑与礼制精神的统一^[3]，该文对《营造

^{*}项目基金：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（20CFX008）；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青年项目（21B0606）；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课题（XSP22YBC568）。

[1] 梁思成：《〈营造法式〉注释》，三联书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2015年版。

[2] 陈明达：《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》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。

[3] 刘思捷：《〈营造法式〉建筑装饰艺术中的礼文化》，载《沈阳建筑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20年第1期。

法式》的法律属性措意不多。部分学者注意到传统建筑在基本精神、装饰方法、功能布局等诸方面深受礼法制度的影响,认为建筑从一定意义上是政治法律伦理的真实反映。相关研究有彭晋媛的《礼——中国传统建筑的伦理内涵》^[1],夏晋的《以“礼”论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的等级特征》^[2]。上述研究采用的礼法制度和建筑装饰相结合的法文化研究视角,为本文提供借鉴,但并未以《营造法式》为主要研究对象。颇值一提的是,学界对《营造令》关注颇多,张十庆^[3]、牛来颖^[4]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,社科院历史所《〈天圣令·营造令〉译注稿》^[5]对《营造令》做了逐条释读,为本文所要展开的《营造法式》与《营造令》比较研究提供了支撑。

综上,20世纪30年代以来,《营造法式》研究主要集中于建筑史领域。20世纪80年代以降,《营造法式》研究走向多元,为本文提供借鉴。然而,如何揭示《营造法式》的法律属性、法律地位及其在工程建筑管理中的法律功能,探究作为法律的《营造法式》的当代启示,仍有进一步申说的必要。

一、《营造法式》的法律属性

从作为法律形式的“法式”入手,进而考察《营造法式》的编纂颁行程序、结构体例,《营造法式》的法律属性将渐次呈现。

首先,“法式”自古有规章之义,是类似现代部门规章的法律形式。据《管子·明法解》载:“案法式而验得失,非法度不留意焉。”^[6]可见,至迟在秦汉之时,“法式”即有法度规程之义。及至两宋,史籍中常有某事“违戾法式”“逾越法式”,凡事“干因革损益,非法式所载者,论定而上之”之说。^[7]可见,宋之“法式”即某事之准据。进而言之,“法式”为法,偏重于与百官职司相关的规章条例,例如,郑玄云:“邦国官府谓之礼法,常所守以为法式也。”^[8]颜师古言:“程,法式也。”^[9]北宋元丰后,中书省制敕库房“掌汇编、登记所颁敕、令、格、式,并随时提供检阅以为百司遵循法式……”^[10]可见,宋代“法式”亦与部门职责密切相关。此外,宋代以“法式”命名的法律文本繁多,例如《禄令法式》《卤簿法式》《番上法式》,均与部门职司相应,是规范某部门职责的规章制度。《营造法式》自不例外,李纲为徽宗作《将作监制》称:“王者体国,凡宫室门闾高下广狭之制,皆有法式,掌于有司……使尽其巧,而依于法,是为称职。”^[11]此处“有司”即将作监。“法式”即规范将作监职司的法度,即《营造法式》。

其次,《营造法式》是奉敕编修颁行全国的规章制度。据《营造法式·劄子》^[12],该书经两次修撰,初次为神宗熙宁间,皇帝命令将作监编修,至哲宗元祐六年书成。后因元祐《营造法式》“只是料状,

[1] 彭晋媛:《礼——中国传统建筑的伦理内涵》,载《华侨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03年第1期。

[2] 夏晋:《以“礼”论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的等级特征》,载《理论月刊》2006年第6期。

[3] 张十庆:《唐〈营造令〉第宅禁限条文辨析与释读》,载《中国建筑史论汇刊·第三辑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,第142-163页。

[4] 黄正建主编:《〈营造令〉与唐宋制度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,第321-380页;牛来颖:《冲突与妥协:建筑环境中的唐宋城市——以〈营造令〉第宅制度为中心》,载《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》(第3辑)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4月版,第67-78页。

[5] 社科院历史所《天圣令》读书班:《〈天圣令·营造令〉译注稿》,载《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》第十二辑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版,第434-461页。

[6] 黎翔凤撰,梁连华整理:《管子校注》,中华书局2004年版,第1211页。

[7] [元]脱脱等撰:《宋史》,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3781、9197、3783页。

[8] [晋]郭璞著,(宋)邢昺注:《尔雅注疏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,第157页。

[9] [汉]班固著,(唐)颜师古注: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71页。

[10] 龚延明编著:《宋代官制辞典》,中华书局1997年版,第171页。

[11] 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《全宋文》第169册,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,第105页。

[12] 梁思成:《〈营造法式〉注释》,三联书店(香港)有限公司2015年版,第4页。

别无变造用材制度；其间工料太宽，关防无术”，绍圣四年再令将作少监李诫重修，再编成书于元符三年，修订后《营造法式》最终于崇宁二年奉敕命颁行全国，即今见《营造法式》。可见，《营造法式》奉敕命编修颁行，具有严格的立法程序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主持编修者——李诫也自认其编修的《营造法式》并非单纯的施工专书，而是规章制度。在《进新修〈营造法式〉序》^[1]中，李诫细数工程建造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之后，说到：“非有治‘三宫’之精识，岂能新一代之成规？”可见，李诫在奉命修撰《营造法式》时，认定其所编为关于工程建造管理的规章制度。在陈述编纂方法之时，他言到：“考阅旧章，稽参众智。”意即，在具体编纂之时，除了参考众人智慧，还参考了旧日典章。在谈及《营造法式》功能时，李诫认为《营造法式》颁行之后，在预算、施工等方面“类例相从，条章俱在”，也就是说，此后的工程建筑事项均有条例规章作为依据。由此可见，从编纂目标、过程以及颁行后的效果等方面来看，李诫均认为《营造法式》是工程管理领域的规章制度。

再次，《营造法式》具有法典式的体例结构，且具体条文的规范属性明显。《营造法式》凡三十四卷，分为总释、总例、诸作制度、诸作工限、诸作料例、诸作图样等部分，具有明显的总、分结构。“总释”“总例”是原则性规定，为总则。其余为分则。其中，诸作制度为不同建筑的样式、制作方式、规格等第等技术与礼制标准，具有明显的可供依循的规范属性。例如，“窑作制度”依长度、口径、厚度将甃瓦分为六等，将方砖分为五等。^[2]诸作工限、诸作料例则为人工物料预算规则。例如，“石作工限”规定：“凡造作石段、名件等，除造覆盆及镌凿圆混若成形物之类外，其余皆先计平面及扁棱功。如有彫镌者，加彫镌功。”^[3]即在石件制作中区分基础性计功和深加工计功。又如，对同一构件区分制作、安装计功，“石作工限”对于角柱的“造作剜凿”与“安砌”分别计功。^[3]此外，诸作料例对同一工序用料区分细致，在石作的“灌鼓卯缝”中，“如用白锡，则每枚一斤，如用黑锡，加一斤”^[4]。其对于耗材计算的精细程度更是令人叹服，例如，彩画作中，“应刷染木植，每面方一尺，各使下项……墨煤，二钱二分八厘五毫”^[5]。此类规定细致全面、切

实可行，既可理解为技术操作指南，也可理解为工程管理规范。

综上，以法学视角观之，“法式”自古有规章之义，在两宋时期，以“法式”为名的规章制度通常规范某一部门事项。在此之中，《营造法式》系规范将作监职司的“部门规章”。《营造法式》奉敕编修，经由法典式立法程序编纂颁行。此外，《营造法式》总、分结合，总则为原则规定，分则规范细致，且兼工程建筑技术规程与管理规范双重属性。

二、《营造法式》的法律地位

有宋一代，律、令、法式等多种法律形式构成有机联系的工程建筑法律体系。探求律、令、法式三者互动关系，可知《营造法式》在宋代工程建筑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。

首先，在工程建筑规制过程中，律、令关系密切，律处罚违反令的行为。《宋刑统·擅兴律》有3条涉及工程建筑，分别为“有兴造不言上待报及料请违实”“非法兴造及非法征杂徭役”“工作不如法不任用及应更作”^[6]，处罚工程兴建不上报待批、预算不实，非法兴建、科征民夫，制作不合法式等3类行为。《天圣令·营缮令》^[7]共载宋令28条、唐令5条、附3条，首次揭开律令时代工程建筑管理令典规范。细绎之，《营缮令》规定工程兴建报批与预算（见《营缮令》宋2、宋3、宋12、宋13、宋15、宋25、宋27条之规定）、各类工程施工限制（见《营缮令》宋6、宋7、宋19、宋26、宋28条之规定）与工程礼制规格与质量要求（见宋4、宋5、宋8、宋9、宋10、宋11、宋16、宋17之规定）等三

[1] 梁思成：《〈营造法式〉注释》，三联书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2015年版，第4页。

[2] 同上注，第321-322页。

[3] 同上注，第333页。

[4] 同上注，第425页。

[5] 同上注，第435页。

[6] 薛梅卿点校：《宋刑统》，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296-298页。

[7] 《天圣令》相关研究，参见黄正建：《〈天圣令〉与唐宋制度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。

类事项^[1]。经比对,律、令规范事项大体一致。其规范关系为,令文为基本规定,律文之处罚对象为违反令文的行为。

其次,《营缮令》是工程建筑管理基本规定,《营造法式》乃其解释补充。若细究之,不难发现,部分《营缮令》的规定并不细致,导致在实践中难以落实。与此相应,《营造法式》对令文进行了细化与补充。《营缮令》宋14条:“诸杂匠,如有别项和雇者,日给米三升。”^[2]实际中,宋代的匠人分为军匠、普通匠人等不同种类。令文并未明确规定不同匠人之间的计功差别,导致上述规定难以落实。《营造法式》细化解了此问题,据《营造法式·总例》:“诸式内功限并以军工计定,若和雇人造作者,即减军工三分之一。谓军工应计三功即和雇人计二功之类。”^[3]以此言之,不同工匠计功的换算关系得以明确,普通匠人计功相当于军匠的三分之二。又如,《营缮令》宋1条规定:“诸计功程者,四月、五月、六月、七月为长功,二月、三月、八月、九月为中功,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、正月为短功。”^[2]“功”即一个劳动力一天所付出劳动的人功计算单位。“功程”即工作量或劳动量。如《宋刑统·名例律》“赃物没官及征还官主并勿征”条载:“议曰:计功作庸,应得罪者,计一人一日为绢三尺。”^[4]此处,令文将工程所费劳动量分为三等,即夏日昼长为长功,冬日昼短为短功,春秋相较之下劳动时间适中为中功。但是,令文并未明示长、中、短功之间的比例和换算关系,以致具体的计功与计酬无法依照上述“三分法”执行。《营造法式》恰对此问题作了解释,其《总例》规定:“诸称功者谓中功,以十分为率。长功加一分,短功减一分。”^[5]意即,以中功为标准,长功为中功的百分之一百一十,短功则为中功的百分

之九十。此外,《营造法式》区分工序与项目的计功与计料细则,均为对令文的细化与释明,进而明确某项具体工程所需的人力与物料,“功限”“料例”二章无不如此,限于篇幅,不再赘述。

再次,《擅兴律》与《营造法式》之间存在直接与间接的衔接关系。在直接衔接方面,据《擅兴律》第242条:“诸工作有不如法者,笞四十,不任用及应更作者,并计所不任赃、庸,坐赃论减一等。其供奉作者,加二等。工匠各以所由为罪。监当官司,各减三等。”其疏议曰:“‘工作’,谓在官司造作。辄违样式,有不如法者,笞四十。”^[6]可见,第242条处罚营缮工作不如法、违样式的行为与相关责任人。笔者认为,此处的“不如法”与“辄违样式”的“法”与“样式”,在北宋徽宗以降,相当部分由《营造法式》规定。具体理由有二:其一,据学者研究,律文中的“不如法”,即不合法式。“辄违样式”之“样式”,即官方规定的产品制作的样式、程式。又据《唐六典·将作监·甄官署》:“凡砖瓦之作,瓶缶之器,大小高下,各有程准。”^[7]《营造法式》是将作监“部门规章”,即将作监主持修撰的关于“砖瓦之作”的“程准”。钱大群先生所言“法式”,在宋代很有可能即规范将作监职司的《营造法式》。在间接关系层面,显而易见,经《营造法式》对令文的细化解释,以及律文对违反令文行为的处罚,《营造法式》与《擅兴律》构成间接衔接关系。

综上,律、令、法式共同构成宋代工程管理法律体系,《营造法式》是这一法律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
三、《营造法式》的法律功能

李诫称:“(《营造法式》)系营造制度、工

[1] 天一阁博物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正:《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:附唐令复原研究》,中华书局2006年版,第343-350页。

[2] 同上注,第343页。

[3] 梁思成:《〈营造法式〉注释》,三联书店(香港)有限公司2015年版,第52页。

[4] 薛梅卿点校:《宋刑统》,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,第25页。

[5] 梁思成:《〈营造法式〉注释》,三联书店(香港)有限公司2015年版,第13页。

[6] 钱大群撰:《唐律疏义新注》,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,第539页。因唐、宋律在此条并无差别,为便于行文,以钱大群注《唐律》为例。

[7] [唐]李林甫撰,陈仲夫点校:《唐六典》,中华书局2014年版,第597页。

限等，关防工料，最为切要，内外皆合通行。”^[1]以文本—实践为视角，考察《营造法式》在宋代工程管理中的运行，可揭示其法律规范功能。

首先，《营造法式》具有维护礼制的法律规范功能。在传统中国，官式建筑是礼制的外在形式。

“礼”的目标之一在于建立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。因此，等级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大特征。传统中国官式建筑的屋顶、脊饰、斗拱、门饰、色彩、装饰图案等无不反映等级。《营造法式》作为宋代营造规程，其工序之要求、人功物料之使用，均随建筑等级规格高低而增减。例如，竹作色额等级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^[2]。对此，前文已论及，此不赘述。

在法实践层面，《营造法式》切实规范礼制建筑，从而维护礼法秩序。明堂是天子召见诸侯、治理朝政、祭祀祖先的场所，乃礼乐制度的重要象征性建筑。在“治人之道，莫急于礼。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祭”^[3]的传统中国，明堂的建造过程必然严肃慎重。据载，政和五年（1115年），徽宗欲建明堂，与李诫、蔡攸等人讨论建筑设计细节。^[4]仅就蔡攸而言，他对明堂之规模、设色、结瓦以及角铃、螭首、戟门等构件的设置、纹饰、形制等问题提出建议。^[5]例如，就明堂宫殿是否设置角铃，蔡攸认为“今明堂稽古制作，咸有法式，角铃不当复用。”^[6]就殿基装饰，蔡攸提出：“修造法式，殿基用石螭首……”^[7]其一，《营造法式》确有殿阶螭首（属石作制度）、角铃（属旋作制度）等细致规定^[8]；其二，蔡攸建议在政和五年（1115年），与《营造法式》颁行相去不远，此处所言“法式”有可能即《营造法式》，可见法式在建造明堂

礼制建筑中的规制作用。在地方州县，祭祀山川土地之社坛，是重要的礼制建筑。儒家认为，祭祀可启发执政者的尊敬仁爱之心。在信州永丰县社坛的修葺中，陈亮记曰：“（知县潘友文）即命工役整治其坛，一如法式。”^[9]可见，法式亦放地方地方州县礼制建筑的建造活动。

其次，《营造法式》具有统一建筑标准的法律规范功能。据称，早在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，宋廷承袭唐制设军器监。元丰改制，置军器监、少监为长官、副长官，主管制造兵器等事务的军器监规定“制作法式”，以制作的“精粗”，即制作标准为赏罚。^[10]可见，军器监振职之后，颁行了“法式”，并依照“法式”管理实务，此处“法式”，应即《军器法式》，与《营造法式》同属一类法律形式。军器监与将作监职司在宋初同属三司，分别为胄案、修造案。随着官制改革，军器监、将作监自神宗熙宁年间分出。此事从仁宗年间的《天圣营造令》的规制对象仍包含建设工程及军器可觅踪迹。既然军器监以其制定颁布的“法式”作为工作准则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将作监制定的《营造法式》中的“诸作制度”也同样成为营造活动的样式标准，在营造管理中依此执行。

重和年间，宋人李新在记述潼川修缮城垣的具体细节之后评价道：“土木瓦石之用，高卑厚薄，长短曲直，委曲缕蔓，细入无间，靡有不经意者……考元丰法式，无一芒之误。”^[11]显然，元丰法式成为修城施工标准。类似记载尚有不少，例如，程俱为王汉之所撰行状中记载，崇宁年间，王汉之出知瀛洲，当时朝廷令边郡修缮城防

[1] 梁思成：《〈营造法式〉注释》，三联书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2015年版，第7页。

[2] 同上注，第426-427页。

[3] [清]孙希旦撰，沈啸寰、王星贤点校：《礼记集解》，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1236页。

[4] 刘琳、刁忠民、舒大刚、尹波等点校：《宋会要辑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1166页。

[5] 《全宋文》收蔡攸《明堂制度议》（一至九），参见曾枣庄、刘琳主编：《全宋文》第149册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46-251页。

[6] 曾枣庄、刘琳主编：《全宋文》第149册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46页。

[7] 同上注，第248页。

[8] 梁思成：《〈营造法式〉注释》，三联书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2015年版，第75、287页。

[9] 曾枣庄、刘琳主编：《全宋文》第280册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60页。

[10] 邓广铭、程应镠主编：《中国历史大辞典·宋史卷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145页。

[11] 曾枣庄、刘琳主编：《全宋文》第134册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132页。

守备,即“时朝廷下边郡展楼橹、布埤堦、新守具、除戎器,广袤长短一以元丰法式从事”^[1],可见,朝廷认为,城防修缮应遵守元丰法式。上述或为《营造法式》成为建筑标准的旁证。那么,下例应为其在工程管理中统一建筑标准之实例。据周必大所记,麻姑山仙都观栋宇在庆元六年毁于火灾,“知观事李惟寅创正殿七间,博十丈,深六丈有奇,依《营造法式》。”^[2]可见,《营造法式》在此处为道教建筑建造标准。再次,《营造法式》具有管控人功、物料的法律规范功能。宋人重视制定规范管控功、料预算。在类似的军器缮治领域,徽宗政和年间,《宋会要辑稿·舆服六》载:“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司奏:江宁府都作院岁额合造马甲四百副,旧丝黑漆。今承降到朱红马甲工料法式样制,合用三朱为衬。”^[3]可见,工料法式规范都作院制作具装用料。同时,制定工料法式的目的,除了规定用材,还在于节用工料。早在熙宁年间,蔡承禧编对修造等借由“御前制造”造成浪费一事提出:“乞授以法式,悉付所司,庶使课定之科皆有常限,财不耗糜。”^[4]

《营造法式》既为将作监履职准据,考察将作监以及修内司、八作司、修造司等隶属于将作监各官司的相关职能运作,可一窥《营造法式》在功料管控中的法律功能。据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三十》:“(乾道)七年八月五日诏,令于丽正门里东壁慢道上修盖太子宫门一座,所属委官计料,如法修盖。”^[5]可见,修内司奉命主持修盖宫廷之时,要依照规则核算材料。又据载:“八作司拣谄会书算、勾当得事殿侍十人,分擘应副监修”,负责计算所需“直钱”,且“各置功课历,每日抄上,赴提点修造官通押。”^[6]此处的“直钱”,即功料费用。可见,有司于建造工程之时,设置“监修”一职,其职责为“计工料”,且所计应每日上报。此外,如果工程修造不力,造成劳费,则将定罪处罚。例如,“大中祥符二年六月,诏:‘自今八作司凡有营造,并先定地图,然后兴工……’,先是,遣使修吴国长公主院,劳费颇甚。帝闻之,令核罪而条约之。”^[6]宋人文集中,对于工程工料的计算则更为详细。李新在《进潼川府修城图状》中,详细记载了崇和年间修缮潼川城所费工料并上报朝廷,如其所述:“分城为十大料,每一大料分为七小料,丈尺不等,均定工数兴筑。共役

三十五万二千三百九十六工”。^[4]综上,从官司的“计料”“监修”实践以及宋人对于工料的细致记载可知,朝廷颇为在意法式对功、料的管控,上述工作的背后定然有非常细致的功料计算准据。功料预算原本为《营造法式》修撰的主要立法目标之一,述工作的准据很有可能即《营造法式》或此前的元丰、元祐法式。

四、作为法律的《营造法式》的当代启示

从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视角言之,深入研究《营造法式》的法律属性、法律地位与法律功能,具有当代启示意义。

一方面,《营造法式》研究有助于推动法学与建筑学在新文科背景下的交融发展,提升工程法学的理论深度与历史厚度。2018年,教育部提出,要全面推进“四新”(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、新文科)学科建设,总目标是在我国原有学科基础上,通过学科整合、开拓创新、凝练特色,建成能反映中国特色理论水平、学术水平和话语水平的世界一流学科,创建世界一流大学。^[7]从学科维度看,新文科之“新”主要体现在人文精神的主题变化、多学科交叉融合和信息技术影响等方面。综合性是新文科的重要特点,学科交叉和科际整合已经成为推动学科建设的重要手段。^[8]学者指出,新文科将是古今打通、文理打通、人文与社科打通、中与西打通、知与行打通的“五

[1] 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《全宋文》第155册,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,第367页。

[2] 同上注,第271页。

[3] 刘琳等点校:《宋会要辑稿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,第2295页。

[4] 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《全宋文》第83册,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,第194页。

[5] 刘琳等点校:《宋会要辑稿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,第3793页。

[6] 同上注,第3794页。

[7] 安丰存、王铭玉:《新文科建设的本质、地位及体系》,载《学术交流》2019年第11期。

[8] 张俊宗:《新文科:四个维度的解读》,载《西北师大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2019年第5期。

通文科”^[1]。在新文科背景下，部分高校探索文理融合，卓有成效地开设“工程法学”这一法学与建筑学交叉学科。^[2]《营造法式》作为现存最早的传统工程建筑法典，其法规范与法实践是传统工程法律文化的重要篇章。深入研究工程法史，是工程法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构成，将提升工程法学的理论深度，夯实工程法学研究的历史厚度，进而为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、强烈家国情怀、扎实法学根底的复合型法治人才贡献力量。

另一方面，《营造法式》研究有助于传承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，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。”^[3]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，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同时，学者们也指出，“法典化”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然之举，是推进“中国之治”的重大法治工程。^[4]恰逢其会，秦汉以降，传统中国重视法律的成文化与法典化，以法典为统率的成文法体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特色。因此，我们在推进“法典化”的进程中，除了借鉴他山，取外来文化之有益者，更应该发扬传统法律文化之优长，此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然路径。

应当指出，中华法系不仅有律典，《营造法式》是国家统一颁行的规制营造活动的“部门法典”，

是中华法系法典传承脉络的重要侧面，《营造法式》所蕴含的深刻法理，值得深入发掘与发展。工程建设事关国计民生，反观现实，在司法实践中，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各类法律问题较为突出，工程建筑法律法规存在争议与龃龉是部分原因之一。^[5]因此，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工程建筑领域的系统立法。《营造法式》具有较为科学的法典体例，与律、令等法律形式协同配合，可为我们完善工程建筑法典编纂提供法律文化支撑。

综而述之，以法学视角观察《营造法式》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：其一，《营造法式》据有明显的法律属性。“法式”自古有规范之义，《营造法式》具有法典式的编纂颁行程序、体例结构与规范属性。其二，《营造法式》与《营缮令》《擅兴律》互动关系明显，三者共同构成宋代工程法律体系，《营造法式》在其中有独特的法律地位。其三，以文本—实践视角观之，《营造法式》作为将作监等部门从事工程管理的准据，在维护礼制、统一建筑样式以及管控功料等工程管理活动中具有多重规范功能。其四，从法学角度研究《营造法式》，可推动新文科背景下法学与建筑学交融发展，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可为当下工程建筑管理法治化提供借鉴。《营造法式》作为中华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，不应只被看作古代工程建筑技术专书，也应作为一部工程建筑法典，受到学界关注。

[1] 徐显明：《新文科建设与“新法学”教育的挑战和应对》，载《新文科教育研究》2021年第1期。

[2] 朱冰：《基于跨学科的创新型法学人才培养——同济大学工程法学教育实践》，载《法学教育研究》2016年第2期。

[3] 习近平：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》，载《求是》2021年第5期。

[4] 谢红星：《发现“法典化”传统的法理：价值、进路与限度》，载《东岳论丛》2021年第11期。

[5] 石佳友：《〈民法典〉建设工程合同修订的争议问题》，载《社会科学辑刊》2020年第6期。